

高質量民主不應只在投票時被喚醒



銳評

韓成科

第八屆立法會選舉成功舉行，今屆選舉展現出眾多特點，三個界別的投票率都穩步提升；選舉的競爭性不斷提高；候選人的競爭由過去的黨派之爭、政治立場之爭，轉變成政綱、能力、表現之爭。選舉期間發生的嚴重火災，更充分展現候選人視民如傷、顧大局的特點，整個選舉過程安全、有序、圓滿，選出的90名議員都是實至名歸。

告別以往逢選舉必亂局面

香港新的選舉文化更加業已形成，選舉不再是以往般逢選必亂，逢選必加劇社會對立內耗，而是通過君子之爭的高質選舉，通過理性的討論和社會參與，凝聚社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改革的強大共識。高質民主不單是投票一刻的民主，更是全過程、全方位、能做事、做成事的民主，高質量民主不會只在投票時被喚醒。新選制下兩場立法會選舉的成功實

踐，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充分證明具有香港特色的高質量民主已經深深扎根，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肯定今次選舉是「符合香港實際的高質量民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就」。什麼是高質量民主？固然，高質低質很難明確定義，但回顧香港的選舉歷史，每逢選舉社會必定撕裂，陣營高度對立，一些候選人為了在比例代表制下當選，更樂此不疲地挑動民粹，炒作爭議，這些人進入議會之後自然將這種激進、對立、極端之風進一步「發揚光大」，這正是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風波不斷，政府施政舉步維艱，議會長期陷入內耗的癥結，這些當然屬於低質民主。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是要通過制度建構，在香港建立一套高質量的民主制度和文化。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是某些國家獨有。過去一些人總是戴着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式民主，其實不過是一種西方中心論的反映，以西方制度為唯一標準看待其他國家的民主，自然感到不適應以至要千方百計地否定或貶抑。但近年

來，中國式民主其實已經走上一條中國式道路，更展示出獨特的優勢。

習近平主席對於中國式民主就作出過系統性的論述，強調：「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既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也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切實防止出現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後無人過問的現象」。這套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民主觀，及後逐步完善成「全過程民主」的理論。

中國式「全過程民主」，既重視民主選舉、過程民主，更重視實質民主。香港新選舉制度，正是汲取當中最精華。這體現在選舉回歸選賢與能初心，重在選出德才兼備的人士服務社會。民主的落腳點不是形式，而是能否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能否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否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是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均衡參與。這與西方的選舉有本質上的差別，西方選舉着重形式以及過程，只要符合程序，選出什麼人、可能帶給社會任何危害都不是制度所考慮，只重過程不理結果和影響，這種形式

上的民主，事實證明不足為法。

西方的選民在選舉時是「皇帝」，但在選舉後卻不能對代議士有任何制約，只能等待下次選舉作出獎賞或懲罰，這種的民主其實名不副實。習近平主席就曾形象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意持續監督議員表現

香港的民主在過去很長時期，走的的就是這種「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之路，政客為爭取選票不惜撕裂社會、亂開期票、以打擊政府為己任，當選後就視民意為無物，一切政治掛帥，連惠民政策也照樣「拉布」阻撓，民意根本無法彰顯更遑論監督，這樣的民主當然是低質，也是對香港有害。

香港新選舉制度一大重點，就是扭轉這條民主歪路，讓民主回歸實際、回歸民生，投票的形式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重點，重點是在新選制下，候選人是否以社會利益為依歸，以維護國家利益服務香港

為職志，是否有擔當、有能力、有格局，檢驗選舉的成效就在於能否將這些人選出來，為香港服務，這是香港新選制的特點。而投票結束更不代表民主就休眠，民主的監督、人民的參與、民主的決策都體現在立法會的運作之上，讓人民可以充分參與到政治決策，也讓民意持續監督議員的表現，不必等待四年一次的大考。

今屆立法會選舉在第七屆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不論是選舉安排、過程、結果都展現出高質量民主的特點，以「愛國者治港」為根本原則，回歸為市民謀福祉的初衷，選舉更兼顧了均衡參與性、政治包容性、廣泛代表性和公平競爭性，讓民主在更加公平、公正、公開、廉潔、有序中得到更好保障和體現，扭轉了以往逢選舉必亂的動盪，為集中精力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進一步構建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優質民主。對於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意義，應該從高質量民主的角度去視察，從而不斷增強制度和道路自信，香港特色民主道路必將越走越寬。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及對華挑戰

國際關係

常樂

正當中法元首會晤共同推動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新甲子」走得更穩更好的高光時刻，美國特朗普政府卻拋出其新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際輿論普遍認為該報告意味着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向，認為美國將放棄其長期奉行的全球主導地位，回歸「勢力範圍」政治，從而實現「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而實際上，這一國家安全戰略正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外交戰略的延續，並進一步將其原有理念和政策明確化、系統化、穩定化，以實現其重塑和奠定美國未來長期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新國家安全戰略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美國重提「門羅主義」，全方位推動「美國優先」，在全球戰略上顯露孤立主義和收縮態勢；二是將中國作為最大「假想敵」，大篇炮製所謂「中國威脅論」並全方位部署遏制打壓中國發展空間，在中國問題上顯出強烈擴張主義和激進主義。上述兩點看似沒有直接關聯甚至對立，實際其本質一致，妄圖通過「權力平衡」以實現「美國不能允許任何國家變得過於強大，以至於能夠威脅美國利益」的核心目的。

也可以想像，在特朗普接下來的任期中，中美兩國博弈鬥爭的地域範圍不會減少而會增加，鬥爭的程度不會降低而會增大，鬥爭的影響對兩國來說都將是轉折性的、也都是世界性的。由此，「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將更加嚴峻複雜，面對的國際挑戰將更加多元激烈。

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暗含對華「一體兩翼」遏制戰略。

特朗普的新國安戰略邏輯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各項戰略均未能達到預期，

一方面誤導誤判了美國真正應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反而讓「中國變得富裕而強大，並利用其財富和力量為自身謀取巨大利益」，還促使「印太地區已經並將繼續成為下個世紀關鍵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戰場」。因此，美國要實現國內繁榮，就必須在印太地區成功競爭，從而「贏得經濟未來」。於是，特朗普的「平衡美中經濟關係」就水到渠成了。

新國安戰略報告的邏輯和中美交往實踐已經表明，特朗普一方面打着「對等和公平」的幌子平衡美中經濟關係，以確保「恢復美國的經濟獨立性」和「使美國處於維持世界領先經濟體地位的有利位置」。如果這招被識破和失效，就強調「必須伴隨對威懾的持續重視」，以「預防發生戰爭」來行「戰爭威脅」，並將「這種組合策略可以形成良性循環：強大的美國威懾為更有序的經濟行動創造空間，而更有序的經濟行動則為美國提供更多資源，以維持長期威懾」。

這一威懾首先針對的是中國本體（此即為「一體」），主要指向中國台灣和中國南海。美國這次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威懾軍事威脅」部分，將台灣和南海都納入到對美國有利的「常規軍事平衡」體系和美國「戰略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這次國安戰略有關台灣的篇幅及重要程度遠超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共有8次提及台灣。美國在安全戰略上如此重視台灣，比如近期一直動作不斷：放任日本就台灣問題挑釁中國、通過新的對台法律加強與台關係、實施新一輪對台軍售等等，其「部分原因是台灣在半導體生產領域的主導地位，但主要原因是台灣直接連接第二島鏈，並將東北亞和東南亞分為兩個獨立戰區」；美國直接干涉南海事務，也是認為「全球三分之一的航運每年經過南海，這對美國經

濟具有重大影響」。循此邏輯，美國特朗普的國安戰略竟然直接將「威懾台海衝突」作為其新國安戰略的「優先事項」，真是囂張至極和滑天下之大稽。

為遏制和圍堵中國（特別是台灣和南海），美國新國安戰略作出系列部署，包括「建立一支能夠阻止第一島鏈任何地方侵略行為的軍隊」，「制定強有力措施、輔之以必要威懾，以保持南海航道開放、無通行費」，推動「盟友必須增加國防開支、為集體防禦作出更多實際貢獻」，「與所有可能因此受損的國家（從日本到印度等）進行強有力合作」，等等。

「兩翼」則是指中國本土之外沿太平洋、印度洋東西延伸的兩個側翼，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合作區域，而美國新國安戰略所暗指的主要區域則是東部的拉丁美洲和西部的歐洲。在美國新國安戰略所宣稱的「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對於西半球和拉丁美洲及其之外的國家是凌駕性的，也是排他性的。美國重拾「門羅主義」，其目的就是為了「恢復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保護本土安全及在該地區關鍵地理位置的使用權」，為此，還要「阻止西半球以外的競爭對手在該地區部署軍事力量或其他威脅性能力，或擁有、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資產」，其中就包括重要的礦產、港口等。

美國新國安戰略對西半球和歐洲的有關論述與部署，都有其特別指向，都具象化了其鬥爭對象。拉丁美洲和歐洲是美國傳統勢力範圍和傳統盟友最多的地區，然而這些地區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富有成效的地區，因此美國這份國安戰略報告有很多內容都是對當事國和他國的威脅和威懾，其霸權主義嘴臉顯露無疑。比如，其新國安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希望西半球國家將美國視為首選夥伴，並將（通

過多種方式）阻止它們與其他國家合作；美國的聯盟條款以及提供任何形式援助的條件，都必須以減少敵對外部勢力的影響為前提——包括軍事設施、港口和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權，以及對廣義戰略資產的收購；所有國家都應面臨選擇：是生活在美國主導的、由主權國家和自由經濟體組成的世界，還是生活在一個受遠隔重洋的國家影響的平行世界，等等。

須特別重視美國新國安戰略中的優先事項。

美國新國安戰略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美國優先」，美國優先不僅體現在其全球布局上，還體現在其國內有關事務上。因為美國在世界上的既有地位，即使是美國國內的優先事務，也具有明顯的世界性，並且因其世界性也連帶有了特殊的指向性。並且這種特殊指向性，明顯也是美國政府有意為之。

在這份美國新國安戰略中，「優先」和「優先事項」是兩個十分重要的詞彙，其中「優先」一詞使用26次、「優先事項」使用10次。有一處「優先事項」是報告的一個標題，其中包括大規模移民時代終結、保護核心權利與自由、責任分擔與責任轉移、以和平實現重新定位、經濟安全等5項內容；還有一處認為「威懾台海衝突是優先事項」，直接將台灣問題作為與中國鬥爭優先事項，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其他多處要麼直接涉及與中國競爭領域，要麼值得中國高度重視和警惕。一個超級大國的優先事項注定暗含深意。

美國新國安戰略將兩個領域都作為「最高優先事項」（具體用語略有不同），並且兩領域具有高度關聯性。一是將培育美國工業實力必須成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最高優先事項。報告認為美國經濟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基石，也是美國全球地位的基礎和

軍事力量的必要支撐，因此必須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基礎。二是認為能源主導——恢復美國的能源主導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和核能）並推動關鍵能源組件回流，是最高戰略優先事項。報告認為廉價且豐富的能源將為美國創造高薪就業機會，降低消費者和企業成本，推動再工業化，並幫助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領域的優勢。擴大淨能源出口還將深化與盟友的關係，同時削弱敵對勢力的影響力，保護美國的海岸防禦能力，並在必要時支持力量投送。

與優先發展經濟高度相關，新國安戰略還主張美國要優先開展商業外交，將關稅和對等貿易協定作為強有力的工具。其目標是讓夥伴國發展國內經濟，同時使經濟更強大、更發達的西半球，成為美國商業和投資日益有吸引力的市場。美國與夥伴國之間建立的聯繫將使雙方受益，同時增加西半球以外競爭對手在該地區擴大影響力的難度。

另外，新國安戰略還將繼續保持世界上科技最先進、最具創新力的國家地位，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量子計算領域——引領世界發展作為必須優先關注的發展目標。認為這些是美國核心且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忽視它們將給美國帶來巨大風險。

總之，美國特朗普政府新一份國安戰略報告以中國作為主要鬥爭和競爭對手，將在經濟、政治、外交、科技、「軟實力」等領域與中國展開全方位較量，也將給中國發展帶來多重挑戰和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但是危中有機，只要我們勇抓機遇、堅持做好自己，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我們有這個信心。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建設國際仲裁高地 增強全球影響力(上)



議論風生

康樂

2025年以來，國際仲裁及爭議解決領域的頭部機構不斷匯聚香港設立總部或亞太中心。國際調解院（IOMed）、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SCIAHK）、北京國際仲裁院香港中心（BIACHK）相繼成立，為香港法律界帶來新風活水，也為香港建設爭議解決樞紐、成為仲裁高地注入動能。無獨有偶，近期由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國際仲裁學院（QMUL）與美國偉凱律師事務所（White & Case）聯合發布的《2025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顯示，在最受歡迎的仲裁地評選中，香港與新加坡並列第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的仲裁規則也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的規則同樣位列第二。以上事實表明，香港作為國際仲裁地的公信力、吸引力、競爭力在持續增強。

放眼世界，國際仲裁中心所在地通常也是國際商業、金融中心。巴黎、倫敦、紐約等國際知名仲裁地，同時也是全球商業貿易、金融中心所在地。總部位於巴黎

的國際商會（ICC），作為全球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商業組織之一，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國際商業規則、提供爭議解決服務等。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享有盛譽，多年來位於最受歡迎仲裁規則的榜首。國際商會將商業規則與爭議解決緊密結合、合二為一的最佳實例。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的總部所在地，不僅多年上榜最受歡迎仲裁地，長期以來也是外匯交易、衍生品交易、跨境投資的重要仲裁機構。倫敦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服務反哺了金融業務的發展，為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做出貢獻。

美國仲裁協會（AAA）及國際爭議解決中心（ICDR）總部均位於紐約，作為全球規模最大、交易最為活躍的金融市場所在地，紐約實現了「金融交易所+仲裁友好制度環境」的整合，將爭議解決所在地部署在距離交易最近的地方，為全球資產管理、投融资提供了專業的仲裁平台。同時，作為《紐約公約》的簽署地，紐約的法院體系也為推進全球仲裁的執行貢獻了諸多先例。

回看中國，北京今年率先實現突破，首次成為最受歡迎仲裁地的第四名，其仲

裁選擇率超越巴黎、紐約等世界主要仲裁地。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北京國際仲裁院（BIAC）、深圳國際仲裁院（SCIA）等為代表的中國頭部仲裁機構，在本次國際仲裁調查評比中的成績也實現集體上揚。香港、北京和深圳共同入選最受歡迎的全球仲裁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和深圳國際仲裁院規則共同入選最受歡迎的十佳仲裁規則，這些都成為國家軟實力提升的鮮明體現。中國仲裁機構不僅在規則國際化、人才專業性、服務專業化等方面持續發力，而且在數字基建、智能應用、司法執行方面表現突出，這些都為「仲裁地東移（Eastward Shift）」趨勢做出了巨大貢獻。

「十五五」規劃建議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筆者認為，思考並規劃進一步加強國際商事調解仲裁領域的體系建設、能力建設，將對香港未來一個時期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國際爭議解決樞紐與香港三大中心戰略定位同源共生、相得益彰，高標準、專業化、多元化的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港，

不僅有利於產業發展，也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

「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指出，鞏固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今年以來，香港經濟活躍度與質量同步提升。港股投融资金額不斷突破，截至10月底IPO募資額2160億港元，重回全球第一寶座。資本市場活躍度顯著提升，特別是科技類企業成為上市主力軍，提振了市場情緒，改善了估值邏輯。上市公司的產業結構也隨之升級優化，科技和消費佔比不斷提升，帶來經濟新動能。金融科技創新尤其搶眼，穩定幣立法、Web3生態建設、RWA資產上鏈等為未來打開了想像空間。我們不斷見證金融行業發展的同時，如何能夠提供符合行業特徵、效率需求的法律解決方案、明確爭議解決規則也變得刻不容緩。

ICC於2016年發布的《金融機構與國際仲裁報告》指出，金融機構在以下情況下傾向於選擇仲裁：交易重大或特別複雜；交易保密性受到關注；交易對手是國有實體；交易對手所在司法管轄區承認外國判決存在問題，或者預計根據《紐約公約》執行仲裁裁決比執行法院判決更容易。與

此對應，國際仲裁的優勢通常體現為：仲裁員具有特定行業專業知識，其技術專長成為處理金融糾紛的關鍵因素；根據需求定製程序、仲裁語言、仲裁員的選擇以及證據呈現方式的靈活性；相較於法院判決更容易跨境執行；重大敏感交易所需要的保密性可以得到保障；終局性增強了裁決的確定性，提高裁決效率。隨着涉港跨境業務量不斷增多，交易複雜度提升，各類金融機構對於國際仲裁需求必定與日俱增，這將給香港作為國際仲裁地帶來重大機遇。

再以金融科技為例，《穩定幣條例》已於今年8月1日生效，對穩定幣的發行制度、監管框架、投資者保護做出了規定。但穩定幣在發行、支付與使用過程中所面臨的法律解決方案仍然在熱議中，爭議解決規則也成為業界關注焦點。穩定幣的爭議解決不僅涉及不同法域的規則，同時也跨越了Web2與Web3兩個世界，成為數字資產領域的一部分。如果香港能夠抓住機遇發展與金融科技緊密聯繫的爭議解決規則，增強創新領域的話語權，那麼，對於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必將產生有力提升。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